

高管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兼论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

曲亮^{1,2},任国良³

(1.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2.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 本文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和行业环境、内部创新环境,特别是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纽带要素——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当高管所在企业与高管曾经的政治背景隶属于相同省份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相比不同省份更强,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国有企业所在省份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利润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实证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垄断程度对其利润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但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纳入到模型后发现,垄断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不明显,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国有企业的R&D投入上。经过分析,本文认为,政治俘获理论在我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而国有企业高管去行政化改革将有利于改善政治关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政治关系; 制度环境; 行业垄断; R&D投入; 去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 F406.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2)01—0050—10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大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放弃政府部门职位到企业任职。这种俗称“官员下海”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论,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些“下海”官员是否会利用其政府背景而给企业带来好处。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加以研究,比如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它能给公司带来融资便利性、税收优惠等明显的政策性好处,从而增加了公司价值(Fis-

man, 2001; Johnson & Mitton, 2003; Faccio, 2006; Adhikari 等 2006; Claessens 等 2007),而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系有助于获取创新资源(丁重等 2010)、降低公司多元化风险(张敏等 2009)、影响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肖浩等 2009)、弱化企业的经营效率(Fan 等 2007)。

但是,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放弃政府部门职位到国有企业就职这样的“半下海”问题^①,国内学者研究的却不多。中国经济转轨的“强政府”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为政治寻租和腐败提供了一种政治温床(肖浩等 2009),而当前,寻租和腐败

收稿日期:2011-10-24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S-C-P框架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机制研究”(10YJA630053);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网络嵌入视角的中国有企业交叉上市行为研究”(20100471611);浙江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重点研究项目“伦理决策视角下大股东掏空治理机制研究”(2011A1201)。

作者简介:曲亮(1980-),男,辽宁大连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地方政府行为。E-mail: quliang@mail.xjtu.edu.cn;任国良(1984-),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网络组织与公司治理。E-mail: zhiyelang@sina.com。

^① 由于国有企业本身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政府官员到国有企业任职被认为是“半下海”,而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下海经商”(吴文峰等 2009)。

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中体现的极为明显。为了有效研究这一问题,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有的学者认为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地位带来的利润提升,有学者认为是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长(严海宁等,2009),学者们也从公司治理、政治晋升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周黎安,2004;夏立军,2005)。但是在转型经济体中,公司治理问题可能是一个表层问题,更深入地了解企业与政府的博弈才是问题的关键。

本文深入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层面,利用我国国有企业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利润的主导来源。本文发现,在控制了国有企业规模、无形资产、市净率、资产负债率等国有企业内部特征因素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就高管个人的特质来看,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任职处在同一省域的高管,较二者处在不同省域的高管,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却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另外,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本文以樊纲等(2009)的市场化指数的五个指标来衡量企业所处“寻租”环境地区性差异的衡量指标,结果发现,除了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这一指标外,其他制度环境因素对高管政府背景促进国有企业利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本文没有发现国有企业R&D投入对国有企业利润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结合实证结果,本文就国有企业利润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政治俘获理论可能在我国的政企博弈过程中具备更强的解释力。文章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有关高管政治关系研究的文献,第三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给出了实证结果,最后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是国外文献中所说的公司政治联系或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 / political relationship)的一种形式。政治联系指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政治联系不同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Faccio,2006)。在国外,公司通过选举捐款等形式形成的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会议员的利益关系就是一种政治联系。在我国,公司高管曾经担任政府官员,即高管具有政府背景也是一种政治联系。但

从国外文献来看,目前政治联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司拥有政治联系是否具有普遍性。Roberts(1990)、Helland & Sykuta(2004)、Adhikari等(2006)、Claessens等(2007)等发现,在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家,很多公司都拥有政治联系;二是从事件研究角度检验“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Roberts(1990)、Fisman(2001)都证实了拥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其关联的政治官员去世或者下台时,公司股价(公司价值)会明显受到影响;三是政治联系到底给公司带来哪些好处。Charumilind等(2006)、Adhikari等(2006)、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7)研究发现,政治联系能给公司在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等方面带来好处。

最近两年我国也开始出现大量有关上市公司高管政府背景的研究。Fan, Wong & Zhang(2007)利用我国1993~2001年间中国IPO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样本是国有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不仅没有增加价值;反而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破坏公司价值;而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则发现,民营企业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公司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胡旭阳(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的结论表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要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容易进入金融业,也能获得更多和更长的贷款;Fan, Rui & Zhao(2006)发现,相比较于没有关联的上市公司,我国与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在腐败官员被捕后的负债率明显下降;另外, Li, Meng & Zhang(2006)及陈钊、陆铭、何俊志(2008)研究了影响民营企业参政(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因素,他们的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等制度因素、企业家个人的经济实力、政治身份和家庭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民营企业参政的可能性。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较发达国家相比,公司的政治关系往往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已有的文献研究了上市公司通过政治联系来寻求融资、税收方面的优惠,但少有学者研究当前转型改革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利润或经营绩效的影响,这可能由于国有企业的条件约束繁多,预算约束不硬,内部政治关系复杂,不仅要最求经济利润,而且还要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导致国有企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箱”。这也使本

文无法认清如下几个问题:国有企业高管在利用政府关系寻求本公司乃至个人利益的时候,对资源配置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损害了企业的效率;当政府的“掠夺之手”伸向企业时,企业的政府关系是否真的弱化了这只手的“掠夺力度”?政治关系什么情境下会引导或利用政府的掠夺之手,什么情境下会与政府的掠夺之手交手?国有企业高管到底是一个“生产性”职业还是一个“寻租”职业?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去行政化的政治改革,去行政化是否必要?对国有企业以后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本文认为,上述问题可以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寻求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为国有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并正视政治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对我国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背景的优势,消除其负面影响,提高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Fan, Wong & Zhang(2007)利用我国1993~200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在IPO三年后的收益率、利润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方面的表现不如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政治关系对公司经营绩效有负向作用;肖浩等(2009)也认为,国有企业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和满足其政治目的,必然会使公司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进而损害公司的价值。但辩证地来看,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重要经济工具,为政府实现各种社会功能和政治目的而服务,但高管的政治关系肯定可以为国有企业带来经营发展的资源,如一定的垄断特权或资金上的好处。甚至从政治俘获理论来看,国有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可能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成功俘获政府,使政府成为其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基于这些因素,为了研究国有企业政治关系这一内外部环境的纽带要素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从寻租视角和政府干预视角辩证的提出假设1:

假设1a: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系越强,国有企业可潜在获取的政治资源越多,国有企业越能获得更多的垄断资源和稀缺的经营性资源,从而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经济利润。

假设1b: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系越强,可能受政府更多的干预,越要承担政府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国有企业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进而损害了国有企业的价值和绩效。

本文也要检验一下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的地域性特征,即国有企业高管的政府任职与当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区域在一个省域,是否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在提升绩效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有企业大都居于垄断行业,高管在其政治生涯中所任职的区域与其当前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地域是同一省域的话,可能在进入国有企业任职后将其以前的政治关系发挥的更为极致,在本区域内为国有企业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对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就高管个人的政治经历而言,其政治关系与经营区域处在同一区域时,可以通过政治关系为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

另外,不同的最终控制人的国有企业,其政治关系可能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程度不同。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推行,国有上市公司也开始被民营企业控股,其最终控制人的类型肯定对国有企业的经济利润产生明显的影响。最终控制人是民营企业的国有企业,由于最终控制人的单纯的逐利性,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绩效的影响应该很明显,但是如果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那么他很可能受到国有股作用缺失的影响,从而使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国有最终控股的国有企业与民营最终控股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政治关系在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也可能对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行业环境。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即国有企业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这一外部环境会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影响,樊纲(2009)等将其分为以下五个指标: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企业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述不同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利润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可能会为国有企业带来优质稀缺的竞争资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a。

假设4a: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升能力越强。

另外,制度环境越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可能更为公平,其政治关系不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从而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升作用不明显,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备择假设。

假设 4b: 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升能力越弱。

由于制度环境可以分出五种因素: 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企业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尝试着对不同因素在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也是本文需要考虑的一个外部因素。行业的垄断性为垄断企业带来了超额的垄断收益,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越高,其超额收益可能越高,但是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也可能由于缺乏创新和竞争而阻碍国有企业的发展。基于这些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a: 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垄断地位越高,对其绩效影响越大。

假设 5b: 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弱化作用。

最后,本文还要考虑国有企业内部的创新环境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即国有企业的 R&D 投入是否会提升国有企业绩效。我国国有企业基本居于垄断地位,行业垄断会阻碍企业的创新,这种缺乏竞争的状态会导致企业缺乏发展创新的动力,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前景(孔东民等,2011)。而且就我国当前的政治晋升情况来看,企业高管往往会在创新投入的慢产出与寻租的快收益之间选

择后者,因此国有企业的 R&D 投入对国有企业绩效作用可能不明显。基于这些考虑,本文提出假设 6:

假设 6: 国有企业 R&D 投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四、研究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1、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 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样本的规范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1) 由于金融类公司会计标准的特殊性,对这类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2) 剔除数据不全和最终控制人不详的国有企业样本,最后得到 160 家国有企业的经验数据。本文的财务数据取自 CCER 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的公司高管个人资料数据库,包括企业当前的董事长、总经理的个人简历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于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查找了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简历,查找在以前或现在他们是否担任了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手工整理和判断而得到。衡量制度环境(m)的数据,本文沿用了樊纲等(2009)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①。为了对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进行有效度量,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的主要市场进行了特别处理,有的国有企业是全国垄断的,本文选取了全国市场化相关指标进行衡量,有的国有企业是地方性的,本文选取其所在省域的市场化相关指标来衡量。结合已有的成熟文献,本文也控制了企业规模、账面市值比和杠杆比率等行业特征(孔东民等,2011; Fan 等 2007)。涉及的其他变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名称和解释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Pro	国有企业绩效	国有企业 EPS、ROE
Dsz	政治关系 1	董事长的政府背景
Zjl	政治关系 2	总经理的政府背景
Areadsz	关系区域 1	董事长政治关系与经营区域处在同一区域取 1,否则取 0
Areazjl	关系区域 2	总经理政治关系与经营区域处在同一区域取 1,否则取 0
Ultictrl	最终控制人	国有控股 0; 民营控股 1
RD	R&D 投入	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Size	公司规模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Lev	杠杆率	总负债与总资产比
Sjl	市净率	市净率 = 价格/每股净资产
Wxzc	无形资产	企业为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自身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长期资产
Mono	行业垄断地位	企业销售额占市场总销售额的比例/企业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按照销售额的排序

^①其细化的五个指标: 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企业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本文分别用 m_1 、 m_2 、 m_3 、 m_4 、 m_5 来表示。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样本中的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经历处在6(县级正职)~12(省部级正职)这个权力区间之内。从均值上来看,董事长的政治背景要高于总经理。70%以上的高管其政治关系与当前国有企业所在地处在同一省域。

为了避免各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而影响到模型检验的结果,表列示了样本公司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公司绩效与政治关联的相关系数是0.34,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前,这样的结果表明,与先前的假设一致,公司的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结果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资产负债比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与政治关系负相关。政治关系与垄断成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在10%的水平下显著。另外,政治关联与制度环境负相关,说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国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Std. Dev.	Min	Max
pro	.1901	.2592	-.1132	1.4319
dsz	9.6382	1.3257	6	12
zjl	8.5	1.2083	6	11
size	9.31e+09	2.22e+10	3.75e+08	1.57e+11
wxzc	3.54e+08	1.31e+09	.0001	9.69e+09
sjl	6.0306	5.0730	1.7515	29.1741
lev	.5038	.2018	.0556	.8791
ultict	.2	.4033	0	1
mono	13.35	12.2042	1	53
areadsz	.7169	.4547	0	1
areazjl	.7241	.4548	0	1

企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差,公司越容易跟政府形成较强的政治关联。表中其他的相关系数都不超过0.5,说明如果把所有的变量放到同一模型中,变量之间将不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pro	dsz	size	wxzc	Sjl	lev	Ultict	mono	areadsz
dsz	0.34**	1							
size	-0.08**	0.073**	1						
wxzc	0.07*	-0.10	0.35*	1					
sjl	0.14*	-0.03*	-0.22**	-0.11**	1				
lev	-0.06*	-0.19**	0.24*	0.25**	-0.10**	1			
ultict	0.001*	0.10**	-0.12**	-0.11**	-0.14**	0.03*	1		
mono	0.17	0.37*	0.25**	0.17*	-0.21*	0.03**	-0.15*	1	
areadsz	0.11**	-0.01*	0.09*	0.07*	-0.14*	-0.23**	0.13*	-0.11*	1
m	-0.10**	-0.34**	-0.03**	-0.05**	-0.11**	0.08**	-0.10	-0.01**	-0.08**

注:*, **, *** 分别在 10%、5%、1% 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下同。

五、实证分析

首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回归模型为:

$pro = \alpha_0 + \alpha_1 dsz + \alpha_2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sjl + \alpha_5 wxzc + \varepsilon$;
 $pro = \alpha_0 + \alpha_1 zjl + \alpha_2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sjl + \alpha_5 wxzc + \varepsilon$,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假设1a得到了有效证实。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的政治关系提升了7.5%的企业绩效,而总经理的政治关系为企业绩效贡献了16.4%,国有企业总经理在企业中处在经营管理的地位上,对企业绩效的关注度要高于董事长,这不难理解总经理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

绩效驱动力更大。他们可能更有激励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关系来提升企业的绩效,以此来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

表4 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pro	(1)	(2)
dsz	.0754**	
zjl		.1643***
size	-1.56E-12	-1.1E-11
wxzc	3.15e-11*	9.8e-11*
sjl	0.0070	-0.0037
lev	0.0235	-.3179*
_cons	-.5911***	-1.0158**
R ²	0.1748	0.4156
Adj R ²	0.0741	0.2695
F	1.74	2.84**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 Fan 等(2007)的结论有明显差异,Fan 等(2007)研究发现,政治关系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负向作用。本文认为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Fan 等(2007)的研究选取的样本是 1993~2001 年中国 IPO 上市公司,而本文的经验数据来自 2010 年,研究问题类似但样本时间差距很大,2000 年前后的国有企业与 2010 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可能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明显不同。另外,他们将 1993~2001 年中国 IPO 上市公司的 CEO 的政治背景作为政府干预的替代变量,这种做法忽略了国有企业作为转轨经济特殊主体自身带有的能动性以及寻利和寻租的本性。本文认为,公司高管的过往政府背景可以看做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可能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可以寻租俘获政府,从而有机会利用或者阻碍政府的“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政府的经济工具,作为政府经济干预的一种机制,在社会上发挥一定的经济作用。肖浩等(2009)认为,国有企业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和满足其政治目的,必然会使公司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进而损害公司的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的实证结果也为政治俘获理论在我国政企博弈中的解释作用提供了证据。

为了检验假设 2,本文在沿用假设 1 的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高管的政治关系和经营区域处在同一和不同区域进行分类回归分析,来检验高管的政治背景的地域性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假设 2 明显得到验证。无论国有企业董事长的政治关系与当前所管理的企业是否在同一个省域,国有企业董事长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都存在明显的驱动。但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和经营区域处在同一省域的董事长,其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较不处在同一省域的要高。这说明,国有企业大都居于垄断行业,如果高管在其政治生涯中所任职的区域与其当前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地域是同一省域,可能在进入国有企业任职后将其以前的政治关系发挥得更为极致,在本区域内为国有企业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对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5 政治关系区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Pro	areadsz = = 0	areadsz = = 1	areazjl = = 0	areazjl == 1
Dsz	.0862 **	.0993 **		
Zjl			-0.0331	.1887 ***
Size	4.30e - 11 ***	-2.34E - 12	-4.22E - 12	-7.00E - 12
Wxzc	-7.98e - 10 ***	3.41e - 11 *	4.71E - 11	-1.07E - 09
Sjl	.0196 ***	-0.0015	0.0156	0.0043
Lev	-0.2763	0.1252	-0.0768	-0.2774
_cons	-.7959 **	-.7875 *	0.2816	-1.1620 **
R ²	0.7652	0.2147	0.905	0.5428
Adj R ²	0.6348	0.0637	0.6676	0.3523
F	5.87 **	1.42	3.81	2.85 *

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类型对国有企业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在沿用假设 1 的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基于不同最终控制人类型差异的检验,实证结果见表 6。在通过最终控制人进行分类后,本文发现国有企业总经理的政治关系在国有企业最终由民营控股和国有控股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都不显著,介于篇幅的考虑,本文在此不在对总经理的情况进行报告。但是,基于董事长政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驱动是明显的,而最终控制人是民企的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不明显。这与本文的假设截然相反。

表 6 最终控制人对绩效的影响

Pro	ultict = = 1	ultict = = 0
Dsz	0.0237	.0865 **
Size	-5.36E - 11	-1.67E - 12
Wxzc	3.07e - 09 *	3.16E - 11
Sjl	-0.0306	0.0071
Lev	0.4042	0.0438
_cons	-0.1102	-.7060 *
R ²	0.5366	0.1704
Adj R ²	0.0427	0.0366

本文将国有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纳入到模型中,研究其对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和国有企业绩效相关性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可以看出,市场化指数(m)、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m₁)、产品市场发育程度(m₂)、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m₃)、非国有企业发展(m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m₅)六个指标中,只有产品市场发育程度(m₂)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了显著品市场越成熟,国有

企业高管越愿意通过他们的政治关系获取资源进行生产制造,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樊纲等(2009)将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分为价格由市场决定和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减少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来看,本文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促进了国有企业高管更合理的利用政治关系去获取国有企业发展需要的稀缺资源,从而提升了企业绩效。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国有的政治关系可能会为国有企业带来优质稀缺的竞争资源,这也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a: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升能力越强。

关于国有企业的行业环境因素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纳入到模型中,实证结果如表8中的模型(5)所示。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程度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但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纳入到模型后发现,垄断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不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如表5中的模型(6)所示。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行业

表7 制度环境的调节

Por	(3)	(4)
m2* dsz	.00061**	
m2* zjl		.00129**
Size	-9.55E-13	-6.17E-12
wxzc	2.14E-11	6.39E-11
Sjl	0.0068	0.0109
lev2	0.0159	-0.2968
_cons	-.3346*	-0.6040
R ²	0.1582	0.281
Adj R ²	0.0556	0.1013
F	1.54	1.56

垄断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只是一个表象,国有企业真正的利润来源是靠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或者是国有企业垄断与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二者之间有一个交互作用,从而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了更明显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交互项纳入到模型进行分析,如表5中的模型(8)和模型(9)所示。本文发现,国有企业行业垄断与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二者的共同作用也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表8 行业垄断、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pro	(5)	(1)	(2)	(6)	(7)	(8)	(9)
mono	.0046*			.0019	-.0015	-.0305	-.0581**
dsz		.0754**		.0687**		.1357**	
mono* dsz						.0036*	
zjl			.1643***		.1720***		.2956***
mono* zjl							.0069**
size	-1.21e-12	-1.56E-12	-1.07E-11	-1.69e-12	-1.00e-11	-2.07e-12	-1.10e-11
wxzc	1.99e-11	3.15e-11*	9.83e-11*	2.91e-11	9.74e-11*	3.82e-11	1.26e-10**
sjl	.0079**	0.0070	-0.0037	.0076	-.00495	.0105	.0019
lev	-.1474	0.0235041	-.3179817*	.0216	-.3362	-.0091	-.5210*
_cons	.2832***	-.5911***	-1.0158**	-.5018*	-1.0915**	-1.1348**	-2.1096***
R ²	0.0879	0.1748	0.4156	0.1808	0.4193	0.2326	0.5591
Adj R ²	0.0350	0.0741	0.2695	0.0580	0.2359	0.0949	0.3877
F	1.04	1.74	2.84**	1.47	2.29*	1.69	3.26**

结合上述的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国有企业高管可能利用了其政治关系来俘获政府,获取了超额利益。本文认为,政治俘获理论可能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政府博弈过程中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至于垄断,本文并未发现他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明显的绩

效提升,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垄断程度越强,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越大。

关于国有企业的R&D投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考虑到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滞后性,本文结合曲亮等(2011)的文献,选了滞后两年的国有

企业 R&D 投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右表 9。将 R&D 纳入到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总经理的政治关系在模型中不显著,所以本文在文中未予报告。

表 9 技术创新对绩效的影响

pro		
R&D	-4.08e-09	-1.85e-09
dsz	.4242**	.4105**
mono		.0138
size	-3.71e-11	-3.71e-11
wxzc	1.61e-09	8.49e-10
Sjl	.0473**	.0385*
Lev	-.2186	-.0123
_cons	-4.3516**	-3.9279**
R ²	0.7605	0.8307
Adj R ²	0.4730	0.5343

从表 9 可以看出,我国国有企业 R&D 投入对国有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董事长政治关系和行业垄断后,本文甚至发现国有企业 R&D 投入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不过二者关系不显著。这也验证了假设 6。

六、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和行业环境、内部创新环境、特别是内外部环境的纽带要素——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无形资产、市净率等国有企业内部特征因素后,本文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作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纽带要素,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与当前经营企业隶属于同一省域的高管政治关系,与二者属于不同省域的情况相比,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就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来看,其所处区域的制度环境并未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明显影响,本文只发现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利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调节作用;从国有企业的行业环境来看,其行业垄断程度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但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纳入到模型后发现,垄断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不明显;国有企业的 R&D 投入作为国有企业的内部

环境要素,对国有企业绩效也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结合本文所得的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公司高管的过往政府背景可以看作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辩证的来看,这种政治关系可能发挥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可以寻租俘获政府,从而有机会利用或者阻碍政府的“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政府的经济工具,作为政府经济干预的一种机制,在社会上发挥一定的经济作用。至于哪一个方面会占据主导地位,很可能是受到当时转型改革情境下的政府目标的影响。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重要经济工具,为政府实现各种社会功能和政治目的而服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转变经济结构、促进节能减排,这些政策要义不仅需要民营企业发挥积极作用,更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高管在利用政府背景关系寻求本公司乃至个人利益的时候,对资源配置产生了影响,不能说这种影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明显阻碍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由于拥有较好的政治关系、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其创造性人才相对充足,因而拥有更好的创造性破坏能力(丁重等 2010)。但是,本文研究却发现,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对其创新效率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和行政垄断为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严海宁 2009)。社会创新资源是稀缺的,将部分稀缺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未有效利用,这种逆向选择式的创新成本极为高昂。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本文应深入地分析一下,国有企业高管到底是一个“寻利性”职业还是一个“寻租性”职业?从本文的实证结果以及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来看,国有企业高管可能是一个“寻租性”职业,他们一直享受着“出则为商,入则为仕”的待遇,不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利用政治关系、垄断抬价获取的利润很少会给社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反而可能在“零和博弈”游戏中挤压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加大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当前,我国也在热烈地讨论国有企业是否应实施去行政化的政治改革,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

果,本文认为去行政化是必要的和必须的,高管的政治关系提升了企业绩效不假,但是借政治关系获取本属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资源,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这种政治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并未发挥合理的作用,应该予以取缔。从政治俘获理论来看,国有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可能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利用政治关系俘获政府,使政府成为其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这一视角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国有

企业政治关系为国有企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本文需正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一直以来,国有企业高管基本上都是“能上不能下”,但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经济主体,国有企业高管应该“能上能下”,这样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约束。因此,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高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国有企业政治关系方面的文献,同时为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 Adhikari A., Derashid C. and Zhang H.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6 (25): 574-595.
- [2] Claessens S., Feijen E., and Laeven 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3): 554-580.
- [3] Charumilind C., Kali R. and Wiwattanakitang Y. Connected Lending: Thailand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2006 (79): 181-218.
- [4] 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Can They Squeeze the Stat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 369-386.
- [5] Fan J., Rui O., and Zhao M. Rent Seek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 56-89.
- [6] Fan J., Wong T. J., and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 265-590.
- [7] 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095-1102.
- [8] Helland E. A., Sykuta M. Reg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Boards: Monitoring, Advising or Window Dressing?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4 (47): 167-193.
- [9] Li H., Meng L., and Zhang J.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Inquiry* 2006 (3): 559-578.
- [10] Roberts B. E. A Dead Senator Tells No Lies: Senio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ederal Benefit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0 (34): 31-58.
- [11] 陈钊, 陆铭, 何俊志. 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 一项实证研究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08 (6).
- [12] 樊纲, 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9 年度报告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 [13] 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6 (6).
- [14] 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7 (4).
- [15] 曲亮, 任国良. 中国科技投资效率省际差异的实证分析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1 (6).
- [16] 吴文锋, 吴冲锋, 芮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与税收优惠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9 (3).
- [17] 吴文锋, 吴冲锋, 刘薇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8 (7).
- [18] 余明桂, 潘红波. 政治关系、政府干预与民营企业贷款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8 (8).
- [19] 夏立军, 方轶强.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5 (5).
- [20] 严海宁等. 国有企业利润来源分析: 行政垄断抑或技术创新 [J]. 重庆: 改革 2009 (11).
- [21]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4 (6).
- [22] 丁重等. 政治关系与创新效率: 基于公司特质信息的研究 [J]. 上海: 财经研究 2010 (10).

The Effect of Executive Political Relations to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 Simultaneous Discussion on the De-administration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QU Liang^{1 2}, REN Guo-Liang³

- (1.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cience, Xi'an, Shanxi, 710061, China;
2.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3.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Industry Economic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aspec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ternal area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inter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particular the link elements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We analyze the leading source of profit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mpirically on the executive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level, by using the empirical data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fter controlling som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including the enterprise scale, intangible assets, P/B (price to book ratio) etc, we find that the executives political rela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link element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the situation that executives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in the same province wit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y are working for has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tate-owned performance, comparing with the situation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typ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so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ternal area environment, the system environment of the area does not generate obvious influence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we only find the level of product market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From the angle of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we find that trade monopo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but when we take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into the model, the monopoly effect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not obvious; There is also no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D input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in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After some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finally argue that our country'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ug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ut we should deeply analyze that chief executiv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a "profit-seeking occupation" or a "Rent-seeking" occupation?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as well a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ecutives may be a "Rent-seeking" occupation. And we may draw the conclusion from our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the political capture theory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game playing proces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e-administration reform to executiv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association effect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litical relations; system environment; trade monopolies; R&D input;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administration

(责任编辑:鲁言)